

《雁塔圣教序》的诞生

——一件书法经典的政治性与物质性

李丹婕

内容提要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为高僧玄奘（600—664）所译佛经撰写的序言，太子李治阅读《圣教序》后，随即撰成《述圣记》一文。两篇文章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佛教团体和京师社会而言，意义非凡。不仅被反复抄录于玄奘所译诸经卷首，也被刊刻成碑。其中最早的制作，是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亲书的两方石碑，并立于大雁塔基南的东西两边，后世称为《雁塔圣教序》。对于《雁塔圣教序》的认识，长久以来多囿于艺术层面的欣赏，本文则将其还原至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之中，尝试从历史学角度重构这件书法经典出现的政治背景和物质环境。

关键词 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 玄奘 佛教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在位）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①为高僧玄奘（600—664）所译佛经撰写的序言，凡781字，由太宗亲笔写就，并下令置于玄奘所译佛经的开篇^②。太子李治（628—683）读《圣教序》后，随即撰成《述圣记》（又名《圣教序记》）一文^③。两篇文章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佛教团体和京师社会而言，意义非凡。彦棕（627—649）称：“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浹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④这一热潮一直持续至高宗朝，《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文不仅被反复抄录于玄奘所译诸经卷首^⑤，也被刊刻成碑。其中最早的制作，是永徽四年（653）褚遂良（596—658）亲书的两方石碑，并立于大雁塔基南的东西两边〔图一〕，被后世称

① 八月四日，系据（唐）冥祥《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新修大藏经》T.2052，218页上；《集王圣教序》第23行《述圣记》之后有“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648年8月26日）的记载；（唐）慧立（615—677年以后）初编、彦棕续修、成书于垂拱四年（688）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为“贞观二十二年六月”。

② （唐）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第142—143页。

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46—147页。

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48页。

⑤ 关于敦煌文献中带有《圣教序》和《述圣记》的经卷，参〔意〕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页。

为《雁塔圣教序》。之后又有显庆二年(657)立于缑氏(今偃师境内)招提寺,王行满书、沈道元刻《大唐二帝圣教序碑》^①、龙朔三年(663)六月翻刻《雁塔圣教序》而成的《同州圣教序》^②,至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673年1月1日)弘福寺僧人怀仁通过集字的方式制成“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后世名为《集王圣教序》)^③。

由于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日益隆显的至高地位,《集王圣教序》历来颇受瞩目,近年也有学者从历史学角度重新考察^④,其集政治、佛教与书法于一身的纪念碑属性,已成共识。相比而言,关于《雁塔圣教序》的认识,多数尚限于艺术层面的欣赏^⑤,本文则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雁塔圣教序》及《述圣记》两方碑刻加以考察,将其还原至所诞生的历史语境之中,重构这件书法经典出现的政治背景和物质环境。

〔图一〕嵌立于大雁塔南侧塔基的《圣教序》和《述圣记》
李丹婕摄



① 碑高244厘米、宽104厘米,碑额两侧雕有蛟龙伏绕,正中刻一坐佛,“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八个篆字分刻于佛像左右,唐太宗李世民、太子李治所撰之文均刻于碑之正面。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

② 陕西大荔县,1970年左右移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金石录》注“同州重立”,见(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中华书局,2019年,第67页。

③ 文本包括《圣教序》及玄奘谢表、《述圣记》及玄奘谢表和《心经》及润笔成员题名等内容。

④ 参罗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一个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唐研究》第23卷,2017年,第1—108页,后出版为专著《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荣新江《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的建立与迁移》,载中国书法家协会、绍兴市人民政府编《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书法出版社,2019年,第134—141页;前揭[意]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

⑤ 如翁志飞《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实临解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此类成果甚多,不一一罗列。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荒金治、荒金大琳注意到《雁塔圣教序》中大量存在的改笔痕迹,认为是褚遂良在贞观、永徽时代先后书写、先行书而后改楷书所致,参[日]荒金大琳、荒金治《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文物出版社,2010年。

一 太子易主与贞观后期的政局要义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贞观时代的政局转折倏然而至：太子李承乾(619—645)被废，原本十拿九稳的候选人魏王李泰(620—652)意外出局，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以黑马之姿，于当年四月乙酉(4月29日)被立为太子。李治承嗣有两个有利条件：其一，长孙皇后贞观十年(636)去世后，李治一直由太宗带在身边，父子感情深厚，李承乾和李泰的双双出局后，他成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仅剩的子嗣；其二，太子被废之际，李治得到了长孙无忌(?—659)、房玄龄(579—648)、李勣(594—669)等老臣的坚决支持，李世民虽犹豫难决，但最终仍同意由李治承储君之位。不过，虽然出身高贵又不乏帮扶，李治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弱点：在不同场合，外朝大臣一致赞成李治承当太子的理由，是“晋王仁孝”；“仁孝”这个优点在太宗看来，最多是可以“事父兄，为臣子矣”^①。换句话说，虽然出于顾全大局，太宗将李治立为太子，但对这个太子，他不满意，甚至想过更换人选，以至于这个一闪而过并未施行的念头，为五年后的高层政治清洗埋下伏笔^②。

李治承当太子之后，个性务实的李世民随即从内政和外交展开多方布局。一方面，东宫官员精挑细选一应高配，很多要职由朝官兼任，太宗令太子时时随侍在侧^③，使他能在观摩实践中获得历练。另一方面，太宗则想方设法为继承人扫清外部障碍：在国之西边，自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之后，进展差强人意，与此同时，东北问题仍悬而未决，于是，亲历隋末因三次征辽而亡国的李世民，至贞观十九年竟毅然亲征高句丽。此举不止为太宗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同时也宣告贞观政治进入晚期。

在备战东征过程中，李世民始终关注着一个人的动向，那就是贞观初年偷渡出境西行求法的玄奘。贞观十八年，玄奘东归抵达于阗，得知自己西行求法途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高昌王麴文泰已故去^④，高昌国也为唐所灭，他只好投书唐太宗，坦白自己早年“私往天竺”之举，并听候太宗发落。此际唐朝在西域的经略事业尚未完毕，继续向西势必将与西突厥正面遭遇，太宗盼望能从玄奘那里获悉关于西域的第一手情报，遂“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⑤。贞观十八年秋冬之际，玄奘到达敦煌，再次上表，当时身在洛阳的太宗^⑥，即命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负责迎待^⑦。贞观十九年

①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5页。

② 参孟宪实《论吴王恪之死——以〈李恪墓志〉为中心》，《文献》2014年第3期，第52—62页。

③ 参贞观十七年四月人事任命诏书，《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197、6199页。

④ 孟宪实《唐玄奘与麴文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101页；陈国灿《玄奘与高昌王国》，《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2页。

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4—125页。

⑥ 十月甲寅(644年11月18日)，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3页。

⑦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5页；房玄龄可说是太宗最信任的心腹，也是留守京师的最高级官员，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从波斯一路来到唐朝长安，也由房玄龄出迎，皆显示出太宗的重视。

(645)春正月丙子(2月8日),玄奘抵京。

十多年的西行经历让玄奘深知帝王加持、皇室赞助的重要性,所以他对太宗的礼遇非常重视且回应积极。两周后,正月壬辰(2月24日),玄奘赶赴洛阳,觐见正备战征辽东的太宗,此番会晤亦为太宗看重,史称“帝迎慰甚厚”。太宗希望玄奘将他过去十多年亲游西域与天竺之境的经历悉数道来,并诉诸文字,“以示未闻”,同时他见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加之对其非凡意志深感钦佩,热切建议玄奘还俗以资政助国。玄奘则以“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为由拒绝。两人虽谋面匆匆却相谈甚欢,太宗深感“犹未尽意”,遂力邀玄奘随征辽大军一同“东行”,以便“指麾之外别更谈叙”,玄奘则以身有“疾疹”且“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之故,再度拒绝。这一年,玄奘四十五岁,李世民四十六岁,睿智、果敢又互有期待的两个人,言语高妙,寒暄备至,但各自的坚持也清晰可见。

对于太宗和玄奘的首次会晤,我们应该由两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玄奘归国之前唐朝西域经略事业的进展,其二是太宗对佛教的态度。

经略西域自太宗上台之初就是国家要务之一,突破性进展是贞观十四年灭建国百余年的麹氏高昌王国后改立为西州,同时在天山北的北庭(今吉木萨尔北)设庭州,又在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①。此后,太宗派出使者前往“西蕃绝域”^②,与印度、中亚乃至拜占庭王国时有通使。贞观十八年,几乎与太宗备战亲征辽东同时,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出兵交河,讨伐焉耆,开启针对西突厥的军事行动,太宗对此密切关注^③。玄奘过去十数年间的历经之地,与上述太宗西域经略蓝图高度相关,受到太宗礼遇属情理之中;而玄奘的关注点则落在佛经翻译与佛法弘扬,那么,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又如何呢?

太宗之于佛教,虽说并非毫无沾染或截然拒斥,但不曾以帝王之尊诚心奖挹佛教,却是基本事实^④。贞观二年(628),太宗言及梁武帝父子“好释老”致使国破家亡一事,明确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⑤。贞观十三年,道士秦士英指斥《辩证论》,谓实谤皇室。太宗下诏淘汰沙门,并将法琳下狱按问。贞观十五年帝谓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可以说,至玄奘归国之际,贞观时代佛教政策总体上是以抑制为基调的^⑥。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0、6154—6156页。

② 《元武寿墓志》(670年),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74页,078号;贞观年间的中西交通,参荣新江《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页。

③ (九月)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212页。

④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⑤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页。

⑥ 关于唐朝初年佛教政策及其具体执行,参李猛《唐初抑佛政策之定型与巩固——基于贞观十一至十六年间的几个佛教事件的考察》,《文史》2018年第3期,第151—186页;李猛《废省佛教:李渊武德九年废省寺观的再认识》,《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3期,第89—127页。

与皇帝会晤期间，玄奘提请于少林寺译经，为太宗所拒，后者出于笼络与控制，将玄奘安置在贞观八年(634)为其母窦皇后(去世于613年)追福所立的弘福寺(神龙中更名兴福寺)，位于毗邻宫城之东的修德坊^①，并命房玄龄负责满足其他译经人力物力之需求，做到“所须供给务使周备”。进入弘福寺后，玄奘随即启动译经事业，至贞观二十年(646)秋七月辛卯(8月17日)，已完成译经五部五十八卷。递呈这些经书时，玄奘恳请太宗“题制一序”^②，惜未获回应。三天后，《西域记》十二卷修毕，玄奘上表献书。次日即收到皇帝批答，对于《西域记》，太宗表示“当自批览”，至于为译经作序，太宗则自谦“学浅心拙”，“非己所闻”，再次拒绝。拒绝作序一举无疑与太宗对佛教的态度相关，就在同年写给萧瑀的手诏中，太宗明确表示：“至于佛教，非意所遵。”^③显然，太宗此时之于佛教的态度，仍是严苛而谨慎的。

二 《圣教序》撰写的政治背景与诉求

太宗亲撰《圣教序》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提出申请的两年之后。对于这一举动的动机，学者多认为是健康状况的恶化，使得太宗转而寄托于佛教以化解忧生之虑^④。对玄奘及其学问的崇拜和依赖，当然可能导致身为个人的太宗皈依佛教^⑤，但若结合太宗的个性、身份和抱负，以及围绕两文撰写的一系列政治举动，在贞观二十二年这个时间点，太宗亲撰《圣教序》且由李治跟进撰写《述圣记》，恐怕还有更深层且具体的背景有待发覆。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唐朝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基本确立了对突厥汗国旧境各部的支配体制，漠北铁勒诸部的铁骑随之成为唐朝继续东西扩张的重要补给。当年春，太宗旧疾加重，七月往凤凰谷营玉华宫疗养，至十一月稍有恢复。十二月，唐朝发昆丘道行军，联以突厥、吐蕃、吐谷浑、铁勒十三州等部落骑兵，出征龟兹^⑥。同年，太宗遣王玄策等出使中天竺，行前还一度有意请玄奘将《老子》译作梵文，以之携至西域传播^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即便是生病期间，太宗却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政务。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亲撰《帝范》一书赐予太子，纵论治国为君之道，明确提及“一旦不讳，更

① 《唐会要》卷四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845页。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33页。

③ 《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第2403页。

④ 前掲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3页；毕罗进一步发展了此说，参前掲[意]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第21—23页。

⑤ “度僧以树功德”之举相对明确地出于个人健康的考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3页。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0—6251页。

⑦ (唐)道宣撰，刘林魁校注《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卷丙《太宗诏奘师翻道经为梵文，与道士辩核事》一〇，中华书局，2018年，第234页；(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一，中华书局，2014年，第121页。

无所言”¹¹，已有交代后事之意。不久，以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¹²，总领外朝事务。太宗则于二月乙亥(3月23日)，行幸玉华宫¹³。身在行宫的太宗，持续密切关注昆丘道行军的进展¹⁴。同年五月庚子(6月16日)，王玄策传回消息：中天竺王国内政动荡，尸罗逸多(即戒日王)被弑，唐朝联合吐蕃军队，俘虏借政变上台的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导致“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¹⁵。

此后不久，六月庚辰(或为庚戌，即六月初一，648年6月26日)，太宗即传召玄奘。玄奘奔赴途中，屡有使者前来接洽，足见太宗召见之心切。见面稍事寒暄之后，太宗竟旧事重提，欲劝玄奘归俗¹⁶。再次遭到玄奘拒绝，太宗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此后或许可以“助师弘道”¹⁷，还请玄奘讲授了新近翻译的《瑜伽师地论》¹⁸，对其纲目大义颇为中意，感到或有可以为资政的功用¹⁹，紧接着便是为玄奘亲撰序言，即《圣教序》一文。撰成后，在百官侍卫之下，由弘文馆学士上官仪(608—665)宣读，“极褒扬之致”²⁰。太子李治紧随其后写成《述圣记》一文²¹。两篇文章撰成后不久，大慈恩寺行将完工，当年冬十月戊申(10月22日)皇太子宣令，玄奘转至大慈恩寺任寺主，继续译经事业²²。

从拒绝撰写到隆重待之，此举背后的态度转变，势必不止源于健康状况的恶化，而是与当时内政外交的错综局面密切相关。

内政方面。太宗在贞观二十二年即开始进行辅政大臣的布局。除了病榻弥留之际明确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托孤遗嘱外²³，另还有对李勣的安置，即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戊午(649年6月29日)贬李勣为叠州都督，密令李治登基后将其拔擢为宰相，以正式缔结两人之间的君臣关系，此举发生在太宗去世的十天前，无疑是太宗交接权力之要义之一。《圣教序》的撰写，也需从权力交接这一背景加以考虑。对于

〈1〉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1页。

〈2〉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2页。

〈3〉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1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6253页。

〈5〉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第61页；(唐)王玄策后撰成《中天竺国行记》十卷，见《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第2016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57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天竺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8页。

〈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38页。

〈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39—140页。

〈8〉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40页。

〈9〉 杜斗城《唐玄奘的理想》，《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51—61页；并向九州各地颁发其经论译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40—141页。

〈10〉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42页。

〈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46页。

〈1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5页。

〈13〉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8页；《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第4028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7页。

玄奘的影响力，太宗心知肚明，三年前万里返国，长安举城轰动，由暂居之鸿胪寺正式迁至弘福寺，更是引发全民沸腾^{〔1〕}。至贞观末年，在玄奘还俗已无可能的背景之下，太宗或许开始考虑顺势利用玄奘及其代表的佛教能量。

贞观十七年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凉州昌松县鸿池谷曾出现写有“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铭文的瑞石^{〔2〕}，受到太宗的郑重对待，若将《圣教序》的撰写与此后李治亲撰《述圣记》放在一起加以整体认识就会发现，两文与之前凉州瑞石的文本结构高度类似，即将父子二人进行了深度捆绑。两文撰成后不久，借由玄奘从弘福寺至慈恩寺的空间转移和仪式展演，则正式宣告了权力的过渡与传承。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649年1月10日），玄奘移驾大慈恩寺的仪式极为隆重，在仪式队伍中，紧随玄奘法师之后，是“庄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华，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形成“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的景观。与此同时，皇帝、皇太子及所有朝廷高层和文武百官也都或临阁观看或参与其中，“衢路观者数亿万人”则成为重要的见证者^{〔3〕}。这场盛会的高潮，是太子李治亲自巡视慈恩寺廊宇，并在玄奘法师房门帖上一首亲撰的五言诗，史载当时僧俗百姓“莫不歌玄风重盛，遗法再隆，近古已来未曾有也”^{〔4〕}，可以想象此番玄奘迁转的盛景是何等浩荡。通过撰写《圣教序》以示加持，借用玄奘的社会影响力，进而为高宗继位造势，当是太宗隆重其事真正的内政背景。

外务方面，当时中天竺国王戒日王被弑，新主被俘，局势动荡，玄奘出访行经期间曾深受戒日王礼遇，回国后仍保持着和天竺地区高僧的联系，贞观二十二年九月，昆丘道行军取得阶段性胜利，龟兹王、于阗王先后被俘还京^{〔5〕}。唐朝不仅完成对西域南路诸国的控制，还把统治势力拓展至帕米尔地区。将载有《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文的玄奘译经传回西域，当然是塑造并传播唐朝帝王权威和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敦煌文书P.3709“贞观廿二年八月十九日直司书手”写成的《佛地经》之首已有两篇序文，足见太宗“敕贯众经之首”的意图得到了迅速贯彻和传播。贞观二十三年夏，太宗、李治和玄奘一直待在翠微宫，除咨询佛教义理，太宗还详细了解了“西域先圣遗芳古迹”，并感慨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6〕}，扶持并赞助佛教可有力助推唐朝西域战略的施展，或为此语潜在之义。

〔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第128页。

〔2〕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49页；关于“太平天子千年太子”的内涵，可参孙英刚《“太平天子”：中古时代的救世主义与政治宣传》，氏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6页；《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玄奘传》，第5109页；以景观造势，借仪式传播政治家的魅力和成就，太宗对此驾轻就熟，参李丹婕《〈秦王破阵乐〉的诞生及其历史语境》，《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第143—174页。

〔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7页。

〔5〕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1—6261页；《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62页。

〔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7页。

三 褚遂良与《雁塔圣教序》碑的诞生

太宗生命晚期，陪在他身边的，除了李治和玄奘，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即长孙无忌(594—659)和褚遂良(596—659)，后者就是《雁塔圣教序》和《述圣记》两碑的书家。诚如两篇文字的出现有其特定政治语境一样，其最终被行诸法书、摹勒上石的时间点同样值得注意，与褚遂良本人的仕宦、高宗朝的政治风向密切相关。

褚遂良的仕途跃升与其出众的书法技艺密切相关，而这又与太宗本人的书艺趣味分不开。

贞观二十年(646)，由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修撰《晋书》，太宗亲撰四篇传记赞语，分别是《武帝纪》《宣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由此《晋书》亦得“御撰”之名^①；从中可见李世民对南方文学与书法的看重与钦慕。此外，从贞观初年开始，太宗就大力收集、各方购求王羲之法书及其他南朝的重要书法作品^②；他甚至将自己善书的小女儿临川公主取字为孟姜，与王羲之女同名。对右军法书的推崇，可见一斑。

贞观初年，太宗下命京官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有兴趣或天赋者可入宫学习书法，临摹宫廷收藏的法书名品。当时的宫廷书法老师是虞世南(558—638)和欧阳询(557—641)^③。论书法技艺的师承，两人皆与王羲之的书风关系密切^④，且都在文章方面颇有造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一〇〇卷)，虞世南有《北堂书钞》(一六〇卷)。褚遂良父亲褚亮(560—647)亦出身南方，与虞世南、欧阳询同辈且交好^⑤，褚遂良少年便在文史与书法方面展现出不俗的才能，深受长辈看重。638年虞世南去世后，太宗希望再找一位能够讨论书法的行家，魏徵即以其“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为由，将褚遂良推荐给了太宗^⑥，当时正是褚遂良由秘书郎迁起居郎的第三年，他本人对皇帝而言应该说并不陌生。褚遂良不负期待，后来在宫廷收藏王羲之书迹的鉴定事务中大显身手，于贞观十四年(640)编成《右军书目》^⑦。自然，这些经历也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3页。

② (唐)韦述(?—757)《叙书录》记载：“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唐)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卷四，中华书局，2021年，第228页。

③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士”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254—2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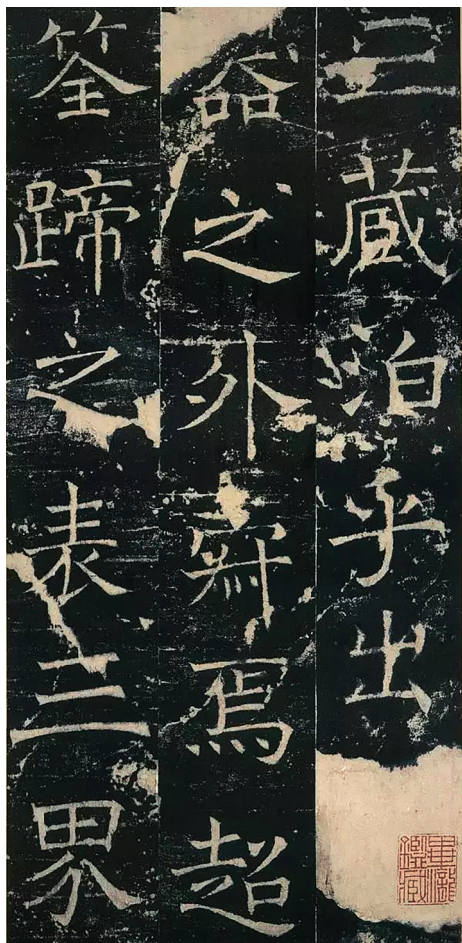
④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2565页；《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欧阳询传》，第4947页。欧阳询的传世作品有《房彦谦碑》《化度寺碑》《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等；虞世南的传世作品有宋翻刻《孔子庙堂碑》，和纸本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传)，上海博物馆藏。

⑤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直言“父友欧阳询”，第2729页；《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称，《虞世南文集》三十卷，由褚亮撰序，第2571页。

⑥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29页；《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第4024页。褚遂良接替虞世南，或许与他的师承有关，按照张怀瓘《书断》(成书于玄宗开元十五年，727)所记，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参前揭(唐)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卷八张怀瓘《书断》中，第444页。

⑦ 前揭(唐)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卷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第121页。

〔图二〕《伊阙佛龕碑》(局部)641年



让褚遂良得有饱览前代法书、领悟书艺精髓的机会，对其个人书写技艺和风格的发展，无疑也是意义重大的。

目前褚遂良传世的作品，以《伊阙佛龕碑》(贞观十五年，641)为最早。《伊阙佛龕碑》又名《三龕记》〔图二〕，位于龙门石窟宾阳洞内，碑石原刻有北魏宣武帝为孝文帝、文昭皇后开凿功德窟的发愿文，贞观十五年，魏王李泰为母亲长孙皇后做功德，抹去原文重新刊刻，造型虽为造像记，实为摩崖刻石。《伊阙佛龕碑》碑文由岑文本撰写，碑面共32行，满行51字，计1600余字。此碑笔画方挺，字形周正，不乏欧字挺拔峻整的风格。欧阳询谢世于641年，说明褚遂良自其晚年，已开始撰写重要的官方碑版文字。《伊阙佛龕碑》的书风，在褚遂良642年撰写的《孟法师碑》中得以延续。

此后，目前可见褚遂良的作品，是写于永徽初年(650年前后)的《房玄龄碑》，该碑据称刻于永徽三年，其结字造型与之前的《伊阙碑》《孟法师碑》已判然有别，笔触灵动，而又不失力度，结字方正宽博，气质洒脱，这一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永徽四年末撰成的《圣教序》和《述圣记》两幅作品〔图三，图四〕。可以说，永徽四年，五十八岁的褚遂良借由《雁塔圣教序》的书写，造就自身书法技艺的巅峰之作，进而也为大唐楷书开启新风^{〔1〕}。

或许并非偶然，褚遂良炉火纯青艺术境界的实现与本人当时的仕宦处境高度契合。褚遂良在贞观后期进入仕途快车道，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升任中书令^{〔2〕}，太宗过世后更以前朝托孤重臣的资历，成为高宗朝地位最高的朝臣之一。永徽元年末，褚遂良因个人购置房产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而一度降低外放，但三年正月(653年2月25日)便重回中央，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3〕}，其背景之深，可见一斑。

永徽三年是高宗在位初期颇值得注意的一年。这年秋，在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柳奭等外朝大臣的一再提议下，王皇后的养子李忠被立为太子^{〔4〕}。同年年末，房遗爱、高阳公主夫妇“谋反”案爆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调查组最终将此案牵涉面无限扩大，吴王李恪、荆王李元景、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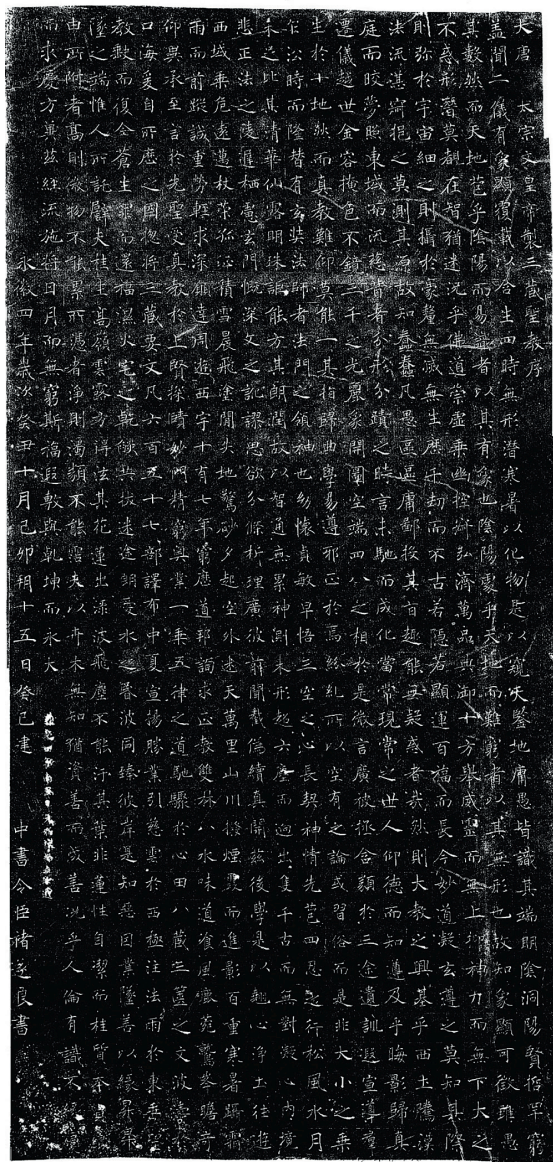
〔1〕 刘涛《初唐三杰》，载氏著《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年，第172页。

〔2〕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61页；《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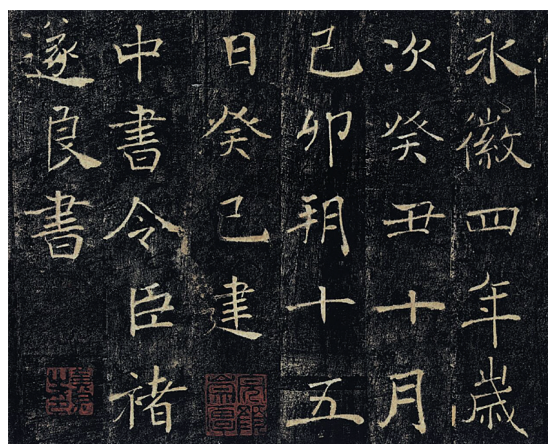
〔3〕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7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8页；另见《旧唐书》卷八六《燕王忠传》，第28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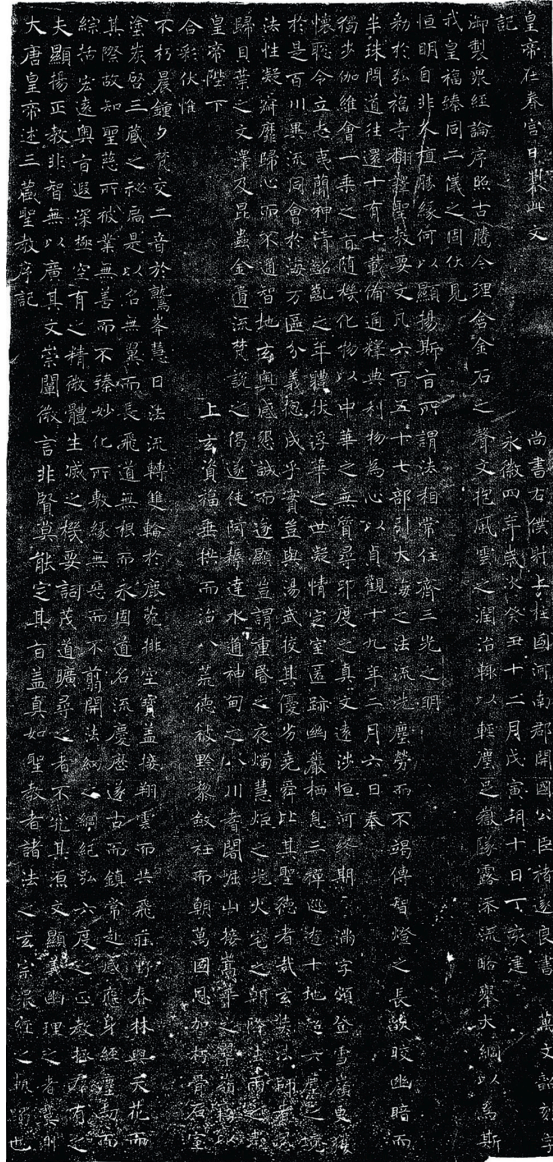
〔图三:1〕《圣教序》拓片扫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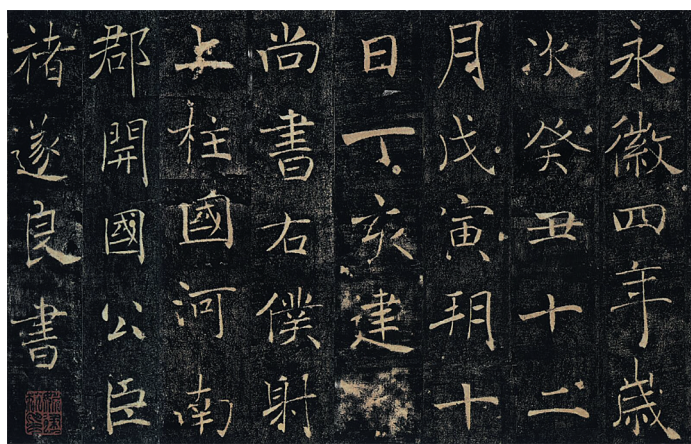
〔图三:2〕《圣教序》拓片褚遂良题款(局部)



〔图四:1〕《述圣记》拓片扫描图



〔图四:2〕《述圣记》拓片褚遂良题款局部(局部)



夏王李道宗等皆被牵连其中¹¹，竟将一次偶发事件发展成打击对手、清除异己的政治行动。就事态主导者一方而言，无疑最终大获全胜。转年九月，尚书省右仆射张行成去世¹²，褚遂良接任此职，同时继续主持吏部工作。可以说，至永徽四年，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位前朝托孤大臣站上了权力的巅峰，在其大权独揽之下，高宗的朝廷异常安静，以至于永徽五年，高宗仍有“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的感慨¹³。高宗即位之初便积极履行君主之职，然而始终没有得到外朝的呼应，看起来无为而治的永徽时代，其实是以高宗本人的缺位与压抑为代价的，而这些隐忍和不甘也成为永徽五年高宗正式启动废王立武计划的内在动因¹⁴。

也是在永徽三年，玄奘提请于慈恩寺修建石塔以存放由西天取回的佛经、佛像、舍利等宝物，并将《圣教序》和《述圣记》立为石碑置于塔基¹⁵，这些建议都得到高宗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如今仍能看到，《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方石碑，东西并立于大雁塔塔基南边。西龕为太宗《圣教序》碑，自右向左书，21行，行42字，共821字，东龕为高宗《述圣记》碑，文右行，20行，行40字，共642字。除了文字布局结构的精心设计，两方石碑上还雕有做工精湛的佛像、菩萨、天王等形象，为后来《集王圣教序》的造型所取鉴。至此，《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文的存在形式，由抄录于经卷之首，转换为石碑立于存放佛经、佛像等法物的石塔塔基，真正实现了“使百代之下诵咏不穷，千载之外瞻仰无绝”¹⁶，这一对文章的物质形态、安置空间和媒介属性进行有意识改变的背后，以皇权护法的政治动机不言而喻。将《圣教序》和《述圣记》两篇文字以石碑的形式加以再现，其实是对一段众所周知、意义非凡历史的重新确认，进而强调了大慈恩寺这一神圣空间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自然，玄奘本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受到了再度加持。因此可以说，文字、书法、石碑、建筑与寺院空间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今人理解两座碑刻的语境。

立碑一举最初或许是由玄奘提出，但作为一次重要的公共事件，则绝无可能仅凭玄奘一己之力落实，因此，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势必都是我们理解石碑呈现效果的重要线索。

就承当先朝托孤、辅佐新主责任的立场而言，玄奘和长孙无忌、褚遂良并无二致。太宗去世前在玉华宫期间，长孙无忌、褚遂良和玄奘曾有过较多的相处与交往，共同见证了《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文的诞生。对于三位来说，与太宗晚年的共处经历都是难得且重要的政治资本，因此，对于将两文刻碑一举只会全力支持，褚遂良则是书家的不二人选。

据碑书系年，《圣教序》和《述圣记》分别写于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653年11月10日）和十二月十日

11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9—6280页。

12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五年（654）闰五月，第6286页。

14 参孟宪实《永徽政治论》，《乾陵文化研究》六，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1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60—161页。

1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33页。

(654年1月3日),时间仅差一月余,两方石碑上褚遂良的署衔却分别作“中书令”和“尚书右仆射”,这无疑是为刻意为之^①,分别对应着他在太宗贞观朝和高宗永徽朝最高级别的官职,显然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资历与身份。仅由这一细节,便可以读出制作者之于两方石碑的思量与用心。无疑,褚遂良在运笔造型方面倾尽全力,追求完美,为了保证书法呈现的视觉效果,石碑的摹勒由唐朝初年著名刻工万文韶担纲。碑版书迹有一半程序由刻工完成,毛笔写就的幽微笔势经过斧凿如何得以保留和再现,全凭刻工的理解和功夫成全。昭陵陪葬墓出土《孔颖达碑》碑座上的刻字遗存提示我们,唐朝初年宫廷刻工的技艺达到了极为高超的水平,不仅可以信手展现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书风,也能自如摹拟二王草书^②,因此,《雁塔圣教序》中相当多细致幽微之处,实亦托万文韶之手一一传出,“竣工勒成告万世”,两方石碑最终的呈现,摹勒之力也是功不可没的^③。

四 结语

作为褚遂良书法技艺的代表作品,《雁塔圣教序》碑自诞生起就受到重视,直至今天,一直受到唐楷学习者的广泛临摹,但也导致关于其碑的认知长久以来限于书法技艺领域。如果说书家关注的对象是拓片的话,本文则将拓片还原至石碑,再结合制作背景和所在空间讨论其内涵与功能,试图在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追溯两幅书法杰作的诞生。这其中,两个历史时刻至关重要:其一是贞观二十二年《圣教序》和《述圣记》两文的撰成,其二则是永徽四年两文以碑刻形态的问世。毫无疑问,石碑规格、造型、装饰、刊刻技法、书法风格和文本内容都值得继续细读,因为两次创作都是隆重对待、巧思妙构的结果,但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其创作或制作的初衷,这一初衷则与本文所述两个历史时刻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

在《雁塔圣教序》的“两次诞生”过程中,褚遂良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就他临死前给高宗的最后陈词来看^④,褚遂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心为主的忠臣,托孤大臣成为他毕生最大的政治砝码,使他以太宗遗志代言人的身份在高宗即位初年迎来权势巅峰。永徽五年高宗以“废王立武”为由头日益强硬的姿态是他始料不及的,以至于永徽六年当面商议废后一事时,褚遂良当仁不让自愿充当几位重臣的代言人^⑤。他一直将高宗看作贞观十七年被“意外”立为太子的年幼皇子,对于相互间身份与关系已有的转变,毫无意识,最终造成了覆水难收的关系破裂。玄奘也因贞观末年、永徽初年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的交往受累,显

① 路远《〈雁塔圣教序碑〉之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文博》2013年第1期,第53—54页。

② 孙迟《昭陵孔颖达碑座上的刻字》,《文物》1979年第12期,第49—51页;昭陵陪葬墓《李愬碑》(贞观二十三年),刻工为万口裕,字型风格与《雁塔圣教序》神似,值得注意,参李子春《唐李愬碑考证》,《文物》1963年第3期,第40—42页。

③ 显庆二年(657)年《赵顺墓志》(58厘米×57厘米;共有27行,满行27字,共计646字)也是万文韶刻的摹勒作品,有助于了解其琢石技艺,墓志参赵文成主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304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9—6290页。

庆元年(656)正月，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更立为太子，当月在大慈恩寺行香设斋，玄奘便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请当朝官员监阅译经，其二是为大慈恩寺立碑，并恳请高宗撰写碑文。无论是玄奘的译经事业，还是大慈恩寺的营建，都已是近十年之前的事了，褚遂良遭贬、武则天称后一个多月的此际有此请求，不得不说是出于政治敏感的表态^①。褚遂良凭借书艺进入政治舞台中央，落幕前夕竟得以留下两幅华彩之作令自己以书法家之名永垂不朽，甚至由此“陶铸有唐一代”书风^②，不得不说有命运之玄机。只是如本文所论，书艺之外，《雁塔圣教序》两碑，还凝固了653年冬因缘际会的一瞬，为理解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的政治史提供了切口。

附记：本文曾先后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观字读碑：历史语境下的文本、石刻和空间”工作坊（2023年4月27日）和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再访《圣教序》：历史、技艺与美学交织下的多重读法”工作坊（2023年5月15日）报告，得到夏炎、毛秋瑾、史睿、毕罗、姚宇亮、田熹晶、王楠等师友的批评赐教，特此鸣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张 露）

① 玄奘译经生涯中永徽六年的空白以及此后蹭蹬委屈的余生，与他被裹挟其中的人际纠葛与政治博弈分不开，参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② 前揭刘涛《初唐三杰》，第171—172页；就敦煌文书可知，《雁塔圣教序》很早就成为书法学习者的临摹对象，如P.2780、P.3127等文书都是例子，参前揭罗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一个王字传统的构建与流行》，第71页。